

蒙古历史研究简史（1921—1996）

AYUUDAI OCHIR¹ 著 宋蓉² 译

（1. 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是对蒙古国上个世纪 20 年代到 90 年代历史学研究的简要而客观的综述。在这一阶段的蒙古国历史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21 年——二十世纪 40 年代末，为民主革命时期；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 40 年代末——1989 年，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期；第三阶段，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为重现历史的真实和引入多元文化论的时期。其中包括了对蒙古考古研究历史的回顾与评价。

关键词：蒙古历史；蒙古考古；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一、史学研究机构和学者

历史研究很早就已在蒙古国兴起和发展了，并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历史著作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些著作中当要首推十三世纪编写的《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这部完成于七百多年前的著作，一经问世就成为世界东方学学者关注的焦点，至今已被译成了十余种语言。除了这部《蒙古秘史》之外，古代的蒙古学者还为后世留下了多部著作。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大致了解长期以来对于蒙古历史的理解和记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本文只讨论 1921 年之后的蒙古国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因为抛开传统的历史著作，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是从 1921 年之后在蒙古出现和发展的。

1921 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几年中，蒙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发展现代文化、教育、科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并因此建立了一批国立大学和专科学校，它们为蒙古国内的知识界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此外还建立了一批新兴学科，如医疗卫生、艺术和科学。

这一时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建立了三所历史研究机构。首先是成立了蒙古科学院。1921 年底，政府决定成立手稿文书学会（The Institute of Scripture and Manuscripts），作为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学会。它的建立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924 年在其指导下成立了历史研究室。1931 年手稿文书学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学会中又新成立了多个研究室，并且学会正式更名为科学学会。

1961 年，在合并了各科学学会下设的十四个学术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现在的蒙古科学院。几乎就在同时，科学院中又成立了历史学会，并且直到今天它仍在蒙古历史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 1924 年在手稿文书学会中成立的历史研究室，还是继它之后 1961 年成立的历史学会，它们都在蒙古的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种学术活动。

另外与历史研究有关的学术机构还有：1976 年在科学院之下建立的东方学会；1977 年成立的哲学，社会与权利学会；1981 年成立的土耳其和哈萨克研究中心。由于这些机构只是负责学术研究，因此又被称作是“基础研究团体”。除了这些学术团体中的研究机构，还有许多学术团体关注于研究不同地区的历史，它们是由一些与政府相关的部门或机构设置

的，所以又被称作为学部学会或者是研究小组。

1955 年，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学会，它直接隶属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另外在蒙古国的军事防御部门还建立了军事历史研究室。1969 年教育部发起成立了教育研究学会。以上这些学术组织均属于前文所说的“学部学会”。

第三类研究蒙古历史的学术机构依托于大学。国立蒙古大学（1942 年）、国立师范大学、蒙古人民革命党学院（1951 年）、农业大学、国防大学（1961 年）等都先后建立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这些在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学院中建立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机构大大增加了蒙古历史研究中心的数量。

总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蒙古国系统地建立了这样三类历史研究机构：单纯的学术机构和学术中心、政府部门下设的学部学会，大学中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

这些学术机构的研究虽然涉及到很多领域，但是他们却都仅从事并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例如：因为大学中的首要工作是教学，所以科研常常会被忽视；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学会进行的是党史的研究；军事历史学会关注的是军事史；而教育学的研究会关注的是各教育层面的历史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订，以及对传统教育方法的研究。

哲学，社会与权利学会，主要研究蒙古的政治、哲学以及法律史；东方学会研究的重点是蒙古的对外关系史；土耳其—哈萨克研究中心关注的则是对生活在蒙古 Bayan-ulgii aimag 地区的哈萨克人和土耳其人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民族学的研究。

随着历史学会在蒙古历史研究领域地位的不断上升，它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蒙古历史的各个方面，并且在研究和出版著作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虽然蒙古政府在这三类学术团体中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但通常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协调各学术团体间的关系。

当 1921 年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蒙古国国内很少有学者专门接受过现代历史学方法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事的是现代蒙古历史早期阶段的研究。这些学者大部分是国内的民主党人，他们在革命前接受了秘密的教育。经过这些学者近二十年的工作，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基本建立了现代蒙古历史研究的基础。四十年代之后第二代历史学者诞生了，他们是蒙古和苏联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蒙古开始有计划地在大学中培养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们或在蒙古国内接受教育，或在海外接受教育，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由于这一系列的积极举措，蒙古国历史研究的队伍逐年扩大。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蒙古国基本停止了向中国派遣留学生。

现在蒙古大约有二百位历史学者拥有学院学位（academic degrees），其中 88.2% 的学者是在 1960 年到 1985 年间取得学位的（其中有 60.2% 的学者是在苏联取得的学位）。从 1990 年开始，除俄罗斯之外，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都对蒙古国历史学者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二、蒙古历史研究的概况

蒙古历史学会和一些历史学者致力于历史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涵盖了从史前史到现代史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范畴，并希望以此来将历史学科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但是蒙古国国内的历史研究是经历了一个特殊而艰难的成熟过程之后才获得发展的。一方面，历史研究的对象是颇具多样性的各不同区域的历史，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十分有限并且他们仅接受过有限的史学训练。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兴趣的转变与蒙古国执政党的变化相关。

基于以下因素，我们可以把 1921 年到 1996 年蒙古历史研究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这些因素包括：由蒙古人选择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核心研究区域以及和国外合作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 1.1921 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民主革命时期
- 2.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1989 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期
3. 重现历史的真实和引入多元文化论的时期

以下就是蒙古史学研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的概况。

1. 民主革命时期（1921——1949 年）

大革命前，蒙古国的历史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满清王朝长时期以来对于蒙古的压制，佛教对蒙古社会的强烈影响以及蒙古社会的落后。1921 年以前编撰的蒙古历史绝大多数都是蒙古大汗、贵族和活佛的传记，在传记中他们被描述成神的化身。甚至很多传说都被看作信史，而这正代表了众多佛教徒的思想。后代的蒙古历史学家称这些著作作为“封建—宗教”史书。因此新时期历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宗教中走出来走近真实的历史，以长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来解释历史事件。

1921 年蒙古国政府设立了第一个科学学术机构——手稿文书学会。他们的工作是翻译并用蒙语编写外文的科学和政治著作，收集以前历代的书籍和手稿以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保护历史文物。这是国家组织历史学家实现政府目标的第一步。

在政府的指导下，以手稿文书学会收集的书籍和手稿为基础创立了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它们继续从事在国内外收集历代书籍和文字资料的工作，并对收集到的资料加以分类和整理。这些工作成为今后历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的重要基础。

A.Amar、A.Dendev、B.Buyanchuulgan、Ch.Bat-Ochir、D.Magsarjav、J.Tseveen 和 D.Losol 这几位学者为现代蒙古历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著作涉及到蒙古历史的许多方面，并且在研究中不仅运用了大量蒙古国内的史料，还引用了许多已被翻译成蒙语的国外相关史料。这些学者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中叶首次出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蒙古政府决定出版一部五卷本或六卷本的《蒙古史》。当时正值蒙古第一部宪法颁布十周年，因此这部《蒙古史》的其中三卷很快就出版发行了。这三卷分别是：由 A.Amar 编写的第一卷，内容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的历史；由 L.Dendev 编写的第四卷，内容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的历史；由 Kh.Choibalsan、G.Demid 和 D.Losol 共同编写的第五卷，反映的是 1921 年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

在这三卷《蒙古史》中，作者尝试对蒙古历史的这三个重要时期进行分析和研究。另外内容涉及十三世纪历史和十九世纪历史的两卷没能出版。通过该大部头著作的编写也反映出当时蒙古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蒙古国国内十分缺少有才干的历史学家。在这三卷《蒙古史》出版后的几年时间里，蒙古国内还有几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问世。例如：B.Buyanchuulgan 编写的《蒙古西部四个部族的历史》；L.Dendevs 编写的《17-18 世纪蒙古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蒙古史》研究的空白。但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在出版时很多章节被删去，致使我们无法看到作者的全部研究成果。另外还有 J.Tseveen 撰写的关于蒙古各部落起源的著作以及 D.Natsagdorj 编撰的《蒙古简史》。

虽然三十年代从事历史研究的这些学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历史学专业教育，但在研究中他们遵循尽可能使用客观史料来重新考察历史的原则。由于当时没有特定的制度化、模式化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方法论的束缚，因此学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待和理解历史，并且可以完全从

历史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早期的封建——宗教史学学者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三十年代的许多研究成果即使到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中，除蒙语史料外，还大量使用了满语、藏语、汉语和俄语史料。不但使用了很多当时可以见到的历史档案资料，同时还参阅了大量历史事件参与者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因此，这些著作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记录保存了很多今天已经无法见到的历史资料。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撰写一些研究性著作，同时还参与一些档案资料和其它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编写工作。此外他们还致力于翻译国外学者编写的关于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和一些外文的蒙古历史资料。这一时期翻译西方著作的学者主要有：**J.Tseveen, D.Natsagdorj, M.Gursed** 和 **N.Jadamba**；翻译东方著作的学者有：**B. Buyanchuulgan, L. Dendev** 和 **Ch. Bat-Ochi**。其中以 **B. Buyanchuulgan** 的成就最大，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和才干的学者，精通满语和汉语，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直到今天他的理论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学者的研究成果常常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出版也呈现出滞后的局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

三十年代的历史学家编写和翻译的这些史学著作成为后来研究的基础，使得历史研究系统化从而推动了蒙古国史学的科学发展。不幸的是，三十年代末蒙古国的政治恐怖和政治迫害使大批学者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A.Amar**，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前任蒙古国外交官硬是被强加上了“人民的敌人、窝藏日本间谍”的罪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D.Losol, B.Buyanchuulgan, J.Tseveen** 也被怀疑与国外的间谍组织有联系并以叛国罪被处死。**D.Natsagdorj, B.Banzragch, L.Dendev** 和 **Ts.Nasanbaljir** 也都被捕入狱。由于这场政治风波的冲击，蒙古国的历史研究陷入了停滞的状态，这一时期暂没有史学著作问世。

1940 年之后，蒙古国诞生了第一支年轻的历史学研究队伍。他们在蒙古国和苏联的大学中接受教育。**Sh. Natsagdorj** 和 **L.Dugersuren** 是其中最著名也最活跃的青年学者。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方向由蒙古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决定，由于政府欲宣传历代爱国英雄和战斗英雄而将其定为历史学家的首要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蒙古人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是 1921 年大革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此外还有一些反映蒙古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国政府要求蒙古的学术界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与此同时，在蒙古国立大学和其它一些研究机构任教和工作的苏联学者对蒙古国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根据这一时代的要求，年轻的历史学家们撰写的文章大多围绕着几个共同的主题：政治的重要性、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影响、当代的社会矛盾。通过 **Sh. Natsagdorj, L.Dugersuren, G.Navaannamjil** 和 **L.Toiv** 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政治要求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些年轻的历史学家接受了马列主义史观，并且成为了马列主义史学研究的生力军。

正如上文描述的那样，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蒙古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三十年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激发起蒙古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向普通大众介绍蒙古民族的历史。因此三十年代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在 1921 年以前的蒙古历史。然而到四十年代，研究的焦点全都转向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1921 年蒙古革命和建立新社会的成就这些问题。1921 年—1940 年间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逐渐占据了

史学研究的统治地位。与时代的主导思想相一致，这时的史学研究被贴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标签。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过渡时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封建---宗教”的研究方法转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1921年到1940年所做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富有独立见解的史学成果。

2. 蒙古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时期（1950年-1989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历史教育在许多新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专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中逐步兴起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成为了三十年代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并且被强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敌人”的罪名，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难再被用于历史教学。国内的这种形势迫使历史学家们必须将编写新的历史著作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首要目标。他们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的资料不但包括了国内关于蒙古历史的原始资料和研究结论，还包括了国外的一些资料，并且他们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这些资料做了修正，想要借此编写出一部从史前时代直至1950年涵盖蒙古国历史各个阶段的蒙古通史。

1954年，作为蒙古国和苏联十年合作研究的成果，《蒙古通史》以蒙语和俄语两种语言同时出版。通过与苏联学者的合作，蒙古国的历史学者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这十年的蒙苏合作研究成功的解决了蒙古国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课题。例如：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这部分内容在书中被称为“古代社会”）；古代游牧部落的文化和文明；蒙古帝国的历史；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蒙古社会、经济和文化；蒙古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其中有的课题是在1921年大革命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另外还有许多重要课题是首次提出。这项广泛的合作研究促进了很多独立的历史研究分支的形成和更多专著问世。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步：研究领域扩展而研究工作更专业。蒙古国史学进步的背后包含着许多国内和国外的因素。首先这时已经形成了很多历史研究的中心，而且伴随着蒙古社会生活的积极变化，国内的历史研究机构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源。这一时期出版工作也逐步趋于正常化和标准化，出版了许多专门的史学研究期刊。档案馆和图书馆也纷纷开始为史学资料和书籍编订目录，使得史学研究可以更加系统的开展。

其次，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国内和国外接受专业教育的历史学者的人数不断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等学历。拥有科学学位（scientific degrees）的专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进步，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且研究领域开始延伸到一些以前从未涉及过的重要历史问题。这一时期通过整理和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并且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证明了历史学研究是存在着广泛研究基础的。

第三，蒙古国学术界与外国研究机构和外国学者的合作研究不断增多。五十年代末，蒙古国加大了与苏联学者的合作力度，蒙苏每年都要对蒙古历史和文化做大范围的合作考察。这种由两国共同组织的考察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并且在考古学、人种学、历史学、碑铭研究、语言学 and 文献学等许多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些成就大大加速了蒙古国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一时期考古学发展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从四十年代末开始，蒙古国与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开展了一些针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些合作研究主要表现在：合编著作、交流研究经验、共同为研究提供专业性建议、共同搜集整理研究资料、共同培训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等。这一时期，虽然蒙古国与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与中、苏的合作在历史研究中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苏联历史学家在蒙古国历史研究中的影响仍然很大。与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合作工作相比，这种状况是不和谐的。1950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蒙古国出版了上百本史学专著、与外国合作研究的成果性著作以及研究蒙古历史方方面面的论文集。其中以《蒙古人民共和国史》（共三卷分别成书于1966年和1967-1969年间）的影响最大。这部书涵盖了从二百万年前直到1965年的蒙古历史，书中运用了很多国际上关于蒙古历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这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是蒙古国历史上第一部如此长跨度的史学著作。

1967年蒙古的史学界出版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简史》一书。并且从1954年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一书中我们就已看出当时的蒙古历史学家们正在逐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在那之后出版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已经成功地溶入到了蒙古国的历史研究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这两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和研究结论对后来蒙古国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且人们对这两部书也留有深刻印象。

以上就是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蒙古国历史研究中最重要史学著作的简介。

考古学 蒙古国的考古调查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考察居住在蒙古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以及这些民族古代社会的情况，以此为史学的基础研究服务。

有许多历史学者，如 Ts. Dorjsuren, N. Ser-Odjav, D. Dorj 和 D. Tseveendorj 以考古发现的资料为基础研究石器时代，研究的内容涉及：蒙古最早的居民；蒙古旧石器时代的一般特征和独有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农业起源问题；古代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埋葬习俗。

D. Dorj 和 D. Navaan 的研究集中在对蒙古疆域的研究和青铜时代蒙古区域特征的研究。G. Sukhbaatar, Ts. Dorjsuren, Kh. Perlee, H. Ser-Odjav 的研究考察了古代游牧部落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他们研究的古代游牧部落包括了：匈奴，鲜卑，Juan-juan，突厥和契丹。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匈奴，鲜卑，Juan-juan，突厥和契丹这些部落都是蒙古民族的重要分支。

M. Shinekhuu 阅读和翻译了大量的土耳其和回鹘的石碑碑文，编写了一本关于岩画的著作。Kh. Perlee 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将 tamghas 石碑上刻画的图案与蒙古人以及其他民族打在家畜身上和牲畜耳朵上的印记做比较，试图以此来了解古代蒙古人的扩张、蒙古民族的起源问题和蒙古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问题。Kh. Perlee 通过对蒙古古代遗迹和中世纪聚落的确认，认为蒙古游牧部落具有的特点与蒙古成为定居国家之后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些部落在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上都与蒙古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中世纪史 在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蒙古社会，封建生产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蒙古的中世纪。

在中世纪历史研究中 Sh. Natsagdorj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首次建立了蒙古封建时代的年代框架，并且首次尝试编写一部对蒙古历史进行全面考察的通论性著作。

Natsagdorj 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了蒙古的封建关系：蒙古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具有不同于其它定居国家的特点；牧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畜之后产生了贫富分化，进而导致了部落组织的瓦解；由于大批的牲畜需要广阔的牧场，草原上的贵族们占据着广阔的土地并且因此

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游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土地所有者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蒙古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土地和牲畜被看作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Natsagdorj 的研究对象还包括了蒙元帝国以及蒙元政权覆灭退居蒙古高原之后的蒙古社会。他认为蒙古封建主义的繁荣正是在这个时期，并且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蒙古封建制独有的特点，其典型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获得了发展，蒙古社会又恢复到了蒙元之前的稳定局面。这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或者说是土地占有的单位——**Otogh**，它取代了以前的 **minggan**。后来 **Otogh** 被另一种称为 **qosighu** 的所有制形式所取代。**Sh. Natsagdorj** 通过研究总结出 **minggan**、**Otogh**、**qosighu** 分别代表了蒙古封建社会三个主要时期所有制形式的特征。**Natsagdorj** 的研究还涉及到了蒙古的社会结构，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蒙古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满清王朝统治时期对外蒙古的政策及其意义。

D.Gonggor将研究定位于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蒙古各部落的牧场，希望通过这些研究确定各部落的起源，研究各部落的部落组织形式。**D.Gonggor**认为十一、十二世纪的整个蒙古各部族应该被划分成两类，即中心部族和其他分支部族。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时期蒙古各自为政的分散的部落组织解体，可汗制这种新的部落组织形式代之而起。在研究中他解释了蒙古古代部落组织的一些术语和亲属关系问题，并解决了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蒙古的土地关系及其变化的问题。他认为蒙古的**khot ayi**不仅是一种农业社会形式，还是游牧牧群管理的一种基本形式，并指出迁徙是游牧社会使用牧场的最主要方法。

N. Ishjamts的研究包括：蒙古的社会结构、行政组织和国家特性；1206年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大帝国在蒙古历史上的地位；反抗满清政府压迫的起义的特征和组织形式，以及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Ch. Dalai致力于编写一部研究十三世纪中期到十四世纪中期蒙元帝国统治时期历史的专著。他的研究涵盖了蒙古社会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的确立、内部冲突的重要性以及经济文化状况等方面。

Ts. Nasanbalijir的研究着重记述了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头十年北部蒙古被划入满清王朝统治版图这段时期的历史。并且考察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蒙古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对于经济的管理。**Ts. Puntsagnorov** 和**Sh. Sandag**的研究包括了：蒙古人民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运动、蒙古如何恢复独立的君主制、以及这一时期蒙古的社会结构问题、国家的管理机制问题和国家的对外关系问题。**S. Purevjav** 的研究考察了喇嘛教的组织结构及其经济管理形式。并试图通过研究说明佛教在蒙古历史发展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M. Sanjdorj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组织和高利贷资本对于蒙古的渗透，蒙古对高利贷资本的实践，以及它对蒙古经济和目前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Ts. Sonomadagva**的研究阐述了十八世纪外蒙古管理体系的工作情况，研究了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蒙古的文化发展以及内部和外部因素对于蒙古文化发展的影响。**Sh. Bira**认为蒙古人与印度、土耳其、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有着密切的文化上的联系。

现代史 现代史的研究与其它历史时期的研究相比更多的涉及了蒙古二十世纪的历史。回顾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不得不充分考虑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它迫使历史学家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B. shirendev 撰写了许多关于二十世纪历史的著作，他研究了二十世纪蒙古历史的特征、历史的驱动力以及1921年蒙古大革命的前提。他的研究还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即蒙古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M. Sanjdorj**研究了1921年建立的蒙古国的政治史。**B. Tudev**讨论了蒙古劳动阶级的形成过程和发展历程。**L. Bat-Ochir**研究了关于蒙古国的合作运动和**negdel**建立的问题。

《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史》是关于蒙古国二十世纪后七十年文化改革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包括文化改革的概况并且尝试建立了一个文化改革运动的年表。这部《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史》还是一部讨论了许多专门性课题的专著，诸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和扫盲运动。

这项研究通过突出强调体现各项文化事业发展的数量的变化和文化机构数量的增多来证明文化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但这些数字上的变化无法体现出这一时期综合性大学、中级和初级学校的发展程度以及医辽保健和新兴的戏剧文化活动对蒙古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书中提到的文化发展和进步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些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但是书中的有些问题是以前的研究从未涉及到的，如对蒙古传统文化的逐步压制的问题、蒙古民族特性的逐渐减退消失的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名称的俄国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蒙古国诞生了第一批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他们开始发表关于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著作。起初民族学家研究的是蒙古各不同的部族或是不同国家流行文化的发展，或者是游牧合作社的牲畜饲养技术，当时有很多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发表。后来，这些学者又将研究的领域延伸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并且为了撰写一部三卷本的综合著作，开始关注蒙古民族发展的总体进程。

这项关于民族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察了大约二十个现代蒙古部族或省区，其中包括了**Khalkhas**和**Oirats**。试图通过研究来了解这些部族的发展以及经济、习俗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物质文化的成分研究，诸如民族风俗、居住地点和现代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

这一时期蒙古国历史研究中的另一个新现象是史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Kh. Perlee**在五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全面概括了前革命时期的史学问题，这是未来研究的开始。之后**Sh. Bira**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研究了蒙古历史学科的起源、发展道路、一般特征和独有的特点。基于以上研究他总结了游牧蒙古的史学传统，这种传统源自于蒙古民族那种比定居原始的生活方式。**Sh. Bira**的研究还阐明了1921年之前佛教对蒙古历史学家世界观的影响的程度。他指出：在大革命之前，蒙古史学是沿着一条相当错综复杂的道路前进的，它是在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之后获得发展的。这些作为他对蒙古历史研究工作调查的结论写入了**Tibetian**。另外**Sh. Bira**还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从未在史书中出现过或者从未被历史学者使用过。**Sh. Bira**首次将这些资料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

然而在大革命以后，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关于史学发展史的著作出版，这项工作在近几年才再次得以开展。大革命之后蒙古国的执政党介入了研究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指令左右了历史学家的观点，在这种压制下，历史研究很难进行下去，也很难获得真实的历史结论。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蒙古国广义的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如考古学、狭义史学（**historiography**）、古文字学、民族学、史料学。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是一个历史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它标志着蒙古国的历史学正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蒙古国在当代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在蒙古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约七十年时间里，不仅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更加专业化，而且国家建立起了一套培养专业历史学者的硬件设施。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术团体的活跃为未来蒙古历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定期稳定地出版史学研究刊物和著作也成为可能，因此目前在蒙古国国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都可以阅读和利用很多历史刊物和历史著作。

经过蒙古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画出一副蒙古史前时期直到二十世纪初历史

发展的图画。在进行了一些重要历史课题的研究之后，学术界定义和规范了历史学科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所有的这些对以后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收集、编辑、翻译和出版关于蒙古历史的各种资料不仅为蒙古国的民众带来了丰富的历史书籍，同时还确立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历史学家向普通公众揭示、分析了历史资料的来源。同时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包括了系统的蒙古史和世界史教育。历史学家参与到了历史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写中，因此有许多新的历史研究成果被编入了教科书。这些从根本上影响了蒙古国历史教学的发展。

最终蒙古国成为蒙古学（十九世纪形成和发展于蒙古国之外的一门学科）研究的中心，并逐渐认识到现代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蒙古历史研究所获得的这些成就是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疗卫生在内的许多领域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完成的。还应当强调的是尽管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学术研究受到了压制和束缚，但是蒙古国的历史学家还是用自己的毕生心血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时他们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人权、自由甚至是生命。尽管存在这些积极的方面，但是历史的真实还是经常被严重的扭曲。八十年代政治公开化之后，历史学家们才得以重新理解和纠正这些问题。

在今天重新回顾蒙古国的历史研究时，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什么造成了在过去七十年的蒙古历史研究中所犯的错误和对历史的扭曲？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并将它作为指导研究的前提，这就使得每一个课题都引起了强烈的争论，但是这些理论又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循的。另一个原因是蒙古国社会政治上和理论上偏激的政见和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提倡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历史研究。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确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其它一些如“阶级论”、“政党论”只会使研究得出偏颇的结论。

蒙古国党和政府对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做出了解释并且要求社会各界都使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各自的工作。因此“政党论”意味着处理和解决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阶级论”也坚持着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政党的政治路线上，“政党论”和“阶级论”作为一种理论，若从这些理论的实质上来理解和解释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得到的解释是蒙古国政府是从他们设想的人民（指以前的被剥削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利益服务。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而进步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最终也是最高阶段。之前的那些阶段，社会可以划分成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也就是两个矛盾对立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被认为是进步的、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必定会取得胜利走向繁荣。相反，与其对立的剥削阶级以诈取劳动者的劳动果实为生，注定要走向灭亡。在蒙古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要求历史学家将阶级意识和政党意识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正是由于运用了这些理论和方法解释历史现象，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于历史事件的曲解，甚至造成了对所有历史真实的扭曲。

在蒙古国，历史学者们总是希望能为成吉思汗做出一个适当的历史定位。但是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统一分散的蒙古各部落这样的历史功绩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仅仅是用很普通的语言记述了蒙古在地域和政治上的统一，以及大蒙古帝国和统一的蒙古民族的建立。

直到1990年，在蒙古国国内人们还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世界历史中，成吉思汗是蒙古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并且成吉思汗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将领，其领导才能也没有

得到公正的评价。相反，他被描述成为一个压迫者、剥削者、大破坏家、强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当历史研究者以这种方式看待成吉思汗时，他们会告诉人民说，成吉思汗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一个征服者。

对1921年大革命之前的学者们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缺乏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喇嘛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人民的成果”，在著作中他们的名字甚至都被略去了。事实上，大革命之前蒙古国艺术和文学上的成就被认为仅仅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成果就是这种错误扩大化的后果。

这一时期，对大革命之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有很多曲解。许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科学、文化生活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都没有被给予正确的评价。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的领导人Kh. Choibalsan和Y. Tsedenbal被颂扬成蒙古人民杰出的儿子和久经考验的伟大领导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真的能够承受如此高的评价吗？从1920年到1983年之间发生的政治肃清事件，有些是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发生的，但是还有很多是这两位领导人自主发动的。据目前所知的不完全统计，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肃清运动中就有35,000人失去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几千人或是失业，或是被流放，或是被捕入狱。当时的史学无法面对这些问题，或者找出各种理由为这些政治事件开脱。但是蒙古的人民革命党却宣称这些冤案的受害者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是外国的间谍，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而事实上这些人只是普通的人民大众。

在1921年之前蒙古国有七百余座寺庙。现在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与其一起被破坏的还有宗教仪式使用的法器、宗教的手稿和典籍以及其它一些历史文物，仅仅只有十座寺院在动乱中保存了下来。大量私人拥有的历史和文化财产也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的“反抗宗教，反抗寺院”的运动中被破坏殆尽。在列宁主义者的认识中，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制造了“残酷”的文化，而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是先进的、进步的。正是这样的认识造成了蒙古国国内大规模破坏历史文物的运动。蒙古国的历史学家给予这些事件的解释是：因为寺庙和寺院扩大了残酷的宗教的影响，是反革命势力、是国外间谍组织的庇护者。而且由于它的存在，男性公民从社会建设中分离了出来，而人民没有理由无偿地供养着他们。研究蒙古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佛教基础时，历史学者努力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错误都与佛教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并且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指责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事实上，是佛教将医学、兽医学、天文学等引入到了蒙古，并且佛教在国家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的精神生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

这一时期歪曲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蒙古国的共产主义者试图以“政党意识”的名义论证他们的政策和运动是正确的。五十年代末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宣传“合作运动”。在运动中，蒙古国牧民几乎所有的牲畜都被登记造册，同时大约有近400个合作组织相继建立。伴随着合作运动的胜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蒙古国确立了下来。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中央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消灭了极端保守的私有制。合作运动被认为是蒙古人民革命党英明领导的一次伟大胜利。然而，合作化使蒙古国国内牲畜的总量明显减少，人民开始变得习惯于不劳而获。

1991年之后，合作组织纷纷解散，牲畜被重新归还给了牧民，成为牧民的私有财产。结果，国内牲畜数量大大增加，从过去的两千五百万头增加到现在的三千万头。

对于国家历史的扭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国外的影响。1962年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科学院计划在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建立一座纪念碑，并组织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他的统治对于蒙古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是一位苏联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I. Mayskiy向蒙古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抗议信，他声称这种对成吉思汗诞生的庆祝活动是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原则相违背的，是有碍于苏联人民和蒙古国人民友谊的。结果，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会做出决定处罚了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以及参与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言的学者。

一般而言，从蒙古国国家利益的立场批评苏联的政策和行为的学者，他们十分同情地对待大革命之前取得的各种成就，正是由于这样他们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国际主义者的敌人、苏联的敌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被指控试图诋毁污蔑苏联和蒙古国人民的友谊，是受到了国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并且这些学者都受到了迫害。1947年到1982年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做出了近二十项这样的判决，处罚和侮辱了许多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包含了蒙古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面对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许多学者都失去了信心，因为独立的思想和创造性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而学者们却要被迫掩盖历史问题的真相扭曲历史的真实。

此外，关于蒙苏的许多重要原始资料和文献以及蒙古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活动，这些重要的资料对于历史学家都是保密的。无疑这一切都对现代蒙古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才知道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都被带到了苏联并保存在了那里。

那一时期历史研究中限制最严格的领域是对于蒙古国疆域的研究。蒙古国科学家的研究是没有自由的，尤其研究生活在蒙古国以外的蒙古人的生活和文化是被严格限制的。这些分散的蒙古各部族居住在不同地域，他们之间相互熟悉了解，并且进行交换和合作。

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蒙古国的科学家们是没有机会与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

这样的学术环境导致了蒙古国的历史研究极其肤浅并最终走向了僵化停滞。考虑到四十年代到1989年这个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我们可以称这一时期是蒙古国历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期”。在那个时期历史研究必须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在研究中必须使用执政党容许的方法论。这样片面的研究造成了对于历史真实的歪曲，对于历史文化财富的毁灭，对于爱国主义和教育很可能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它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当今的蒙古国没有对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予足够的重视，忽视对蒙古历史文物的保护。

3. 多元开放，重建历史的客观性的时期（1990年至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蒙古国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蒙古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和一党专制。这使得蒙古国人民有机会将民族的发展溶入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在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科学研究领域的改革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政府领导的科研机构 and 组织的改革。一方面，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些学会和研究中心进行了合并；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涉及到一些新颖、重要的课题，又建立起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有些研究团体是依托于大学建立的。有些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商业活动，它们中有的转型成为公司，还有的就是私人资助建立的。当然历史研究机构也进行了这样系统的机构改组。

1990年之后成立的研究学会有：1）在国立蒙古大学建立的蒙古学研究会；2）在乌兰巴托大学建立的东北亚研究中心；3）建立于军事学院之中的“军事研究学会”；4）建立于教育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5）隶属于政治平反委员会的关于政治迫害的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的学会和研究中心主要都是在以前学术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成立之初，这些学会和研究中心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历史研究了。东方学会、国际关系研究会和土耳其---哈萨克研究中心合并成立了历史学院学会（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y）。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要将学术组织的基本研究成果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在一

起，同时还可以精简机构人员和节约开支。

学术团体的机构改革同时还影响到了这些学术组织的财政。先前分配科研经费时，还要考虑到研究机构的人员数量。现在实行的是一种新的决策方法：各部门、研究者的计划和项目必须经过专门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讨论。讨论通过的项目会得到完成研究所需的足够资金。但是，目前科学团体的体系和组织改革还在不断完善中。

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以往的研究从未接触过的科学问题，或需要重新审视看待的问题。在这些中心建构了未来蒙古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无疑，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科学领域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因此涉及到的分支学科有历史学、哲学和经济学。蒙古国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了1921年之后的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各个方面，如杰出政治家的传记、国外对蒙古国的政策、政治肃清运动和佛教问题。以往这些问题都被看作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问题，结果导致了对这些问题认识 and 解释的片面化。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考察、定义，以得到新的认识。对这些历史问题再研究的首批成果已经在一些综合研究文章或专著中体现了出来。如今的蒙古国历史研究综合使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理论，并且历史学者们努力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学习外国世界史研究的成果，并且开始为当代的研究寻找适用的方法和理论。以前许多历史问题依靠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现在这些综合理论的应用为这些问题的扩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研究社会、经济方面的方法和理论是基于欧洲农业和社会发展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但是蒙古的文明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和牲畜饲养业基础之上的文明，因此当我们研究蒙古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的历史与定居社会有很大差别。而且这些是进行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

虽然蒙古国的历史学家没有完全排斥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并且还肯定和利用了其中一些积极的方面，但是从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是可以看出历史学家们进一步改善研究的愿望。

近几年，历史学者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学校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些教科书中既有以往的研究成果又有今年新的研究成果。下一步，他们计划为大学和专科学院编写新的历史书以代替现在使用的历史手册。目前为重建历史真实所做出的这些努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让蒙古国的人民大众了解和熟悉他们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状况就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这两个时期蒙古国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必须为国家未来的发展选择一个合适的道路。为了不重复以前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吸取二十世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共产主义时期的错误和成就，并且恢复历史真实的原因。

1990年之后，蒙古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研究从以前专制政府的意识形态限制和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建历史的真实就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而一帆风顺。重要的是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工作习惯中，人们不能很快适应这种环境的改变，不应用新的观点研究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者存在一种偏执的传统，并且很明显这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风格。这不仅对历史研究不利，就是对通常意义上的改革也是不适合的。当今蒙古的历史研究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缺少受现代方法论训练的历史学者，缺少研究设备和资金，而且国家经济和财政的困难也影响着蒙古国史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更为广泛地开展对外关系对于蒙古国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历史学者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外国学者和蒙古国学者在很多项目上展开了合作研究。

目前，蒙古国的历史学家和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学者都进行过合作研究。他们逐渐在合作中相互了解，学习对方先进的方法。当蒙古国决定放弃共产主义制

度，推动改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以前国家的限制和隔离也都随之减弱消除了。历史学研究变得更加开放和客观，进行国际合作和共同研究成为可能。

当蒙古国的史学发展获得一种国际化视角的时候，许多领域都将成为学术自由竞争的舞台，学术界会开始追求一种真正的多元史观来重建历史的真实。这无疑会推动蒙古国未来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附记: 作者现任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是蒙古国当代著名学者之一，长年从事蒙古史、蒙古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发表 70 多篇论文，被译成俄、英、日、韩、土等多种语言。代表蒙古国主持了蒙古国与韩国，蒙古国与土耳其，蒙古国与日本等多国联合考古项目的工作，并作为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大学的客座教授，为培养外国蒙古学研究队伍做出了显著贡献。

这篇文章发在由 Hiroki Oka 编撰，东北亚研究中心和 Tohoku 大学 1999 年联合出版的《东北亚国家的改革》一书中。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n Historical Research, 1921—1996

AYUUDAI OCHIR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of Mongolia)

Abstract: A discussion about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n history from 1921 to 1996 is given in this paper, from a Mongolian historical scholar's angle. First of all, there is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e institution of the research on historiography founded in Mongolia after 1921.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n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based on these factors as below: characte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chosen by Mongolian, the primary method and the core regio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eign co-oper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The first section is from 1921 to 1940s, it is called the tim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econd one is from the end of 1940s to 1989, it is called the time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The last one is called the time about the recurrence of the reality of the history and the import of the multi-cultural theory.

Key words: Mongolia; historical Research; 1921—1996

收稿日期: 2006-06-10

作者简介: AYUUDAI OCHIR, 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